



走过青春

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北京知青李增春向蟠龙镇下坪李家砭村村委会赠送《社区文化》杂志



北京知青向延安知青馆捐赠文物



北京知青回第二故乡



北京知青在曾经工作过的延安水电工程处门口合影

我的姐姐

赵美华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响应国家号召赴陕北农村插队。在异地他乡的艰苦磨砺中,我有幸结识了陕北农村的“亲人”——秦大姐。我们相互交往的点点滴滴,日月月,编织起动人的故事。

1969年2月,我来到延安川口公社插队落户。刚到队里的时候,人生地不熟,不懂当地的方言。他们说“害不哈”,我听的是“害怕”。因此不想和人家多说话,怕引起误会。

在村里住下后,我认识了在这里当民办教师的秦碧云大姐。她是子长人,高中毕业后来这里教学。她为人热情,平易近人,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,并常常邀请我去她家玩。

有时劳动收工后,吃完晚饭,我就去她家玩,同她拉家常。说话时,我放慢语速,她基本能听懂普通话。我通过她了解一些当地的方言、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,并逐渐了解了队里的各方面情况。

我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在老乡的帮助下学会干农活儿。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对初来乍到的北京知青而言,是一种思想上的磨练和实践中的考验。由于离家远,我常常想念北京的父母,从而情绪低落,心事重重。

一天收工回来,遇到秦大姐,她见我精神不好,随口问我:“你咋了,是不是有啥事儿?”我没有回答。她说:“你晚上有时间来我家转转。”晚饭后,我来到姐姐家住的小窑洞里,她正在和娃娃吃饭。一进门,姐姐就问我吃饭了没有,我说已经吃过了。姐姐说:“我们今天吃麻汤饭,你尝尝好不好。”随后就给我舀了一碗。我第一次看到

带黄色油水煮成的玉米饭里还有洋芋,闻着可香了。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吃过饭后,姐姐问我这段时间怎么精神状态不太好,有啥问题想不开。我说:“整天上山劳动,感觉很累;每天吃饭凑合,离家时间长了,想家里的亲人。”说着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,越哭越伤心。姐姐耐心地对我说:“你年龄小,离家远,从未出过远门,想父母我能理解。你从小生活在北京,在大城市长大,吃饭穿衣由父母照管。现在来到陕北农村,干农活背庄稼费衣服。你的衣服裤子破了,我有缝纫机,我帮你补好;棉服脏了,我给你拆洗缝好。”姐姐贴心朴实的话语让我心里热乎乎的,她的安慰和开导让我放下了思想包袱,让我打心里感谢她。后来,我还在姐姐的指导下学会了纳鞋垫和做布鞋。看着自己动手后的收获,喜悦之情在心里油然而生。

几年后,我离开农村,去西北农学院学习。毕业后我回到延安工作,得知姐姐在农村教学时对工作认真负责,业绩突出,已转为公办教师,且调延安七里铺小学任教。我为她高兴,为她欣慰!多年从事教学工作使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,使她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,从而被评为高级教师。

2011年五一劳动节,我女儿结婚。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回延安看望姐姐及一家人,她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开车到延安机场接我们。再次相见,我们二人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。我激动地说:“姐姐我回来了,真想你了!”她眼里闪烁着兴奋的泪花,连声说:“回来就好!回来就好!知道你要回

来,我天天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。今天终于盼来了!”

我和姐姐相拥坐在沙发上,互问身体可好,引荐女儿女婿称呼我的姐姐,告诉他们这是我在延安的亲人。谈话中,我和姐姐回忆着几十年前我在农村的那段岁月,回忆着难忘的姐妹情。女儿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说起往事,动情地说:“我妈妈有力气,在延安认下这么好的亲戚,真有福气。”姐姐高兴地说:“我们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姐妹情终生难忘!我认识你母亲在前,认识你父亲在后,我和你父亲同姓秦,是姐弟关系。你称呼我为姑姑名正言顺。”我高兴地说:“咱们是最亲的一家人!”

2019年4月,我回延安参加宝塔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庆典活动。会议结束后,我立刻赶往姐姐家。一进门,我大声地对姐姐说:“我回来看看你了!”她连忙站起来说:“你来了就好,我正念叨着你呢!你就来了,真是巧合。咱们姐妹俩心心相印,很灵呢!”距离我们上次相见,已经时隔八年。姐姐的子女和孙辈听说我回延安了,全部赶到家里聚会。女士在厨房忙着烧肉,炸油糕,炸鸡泡泡,做粉汤,忙得不亦乐乎。男士忙着摆桌椅,摆碗筷。我和姐姐手拉手地聊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。姐姐说,有的农民自建了楼房,有条件的买了小汽车,有的村民还依靠科学技术种植了大棚蔬菜、小瓜、草莓等水果。听到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打心眼里为乡亲们高兴。祝福我延安的亲人——秦大姐以及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红红火火,蒸蒸日上!

上下铺的情缘

冯军

在延安插队期间,我曾以知青通讯员身份到省城报社学习三个月。幸有一段与王晨共同学习、生活、锻炼的机缘,这还要我们同住上下铺讲起。

1971年初,春节刚过,暮春的残雪还未融化,县城就传来消息:陕西日报社要开办一期“新闻宣传通讯员学习班”,有北京知青插队的县各给一个名额。那年冬,我正好在村里过年,不知是何机遇,志丹县的这一名额竟幸运地落到我头上。

于是,我迎着纷飞的春雪,从插队的小山村翻山越岭,徒步搭车八百余里,终于在一个雪花纷扬的晨曦中,赶到陕西日报社的大红铁门前。

踏着省报大院吱吱作响的雪地,我们来到灯光摇曳的值班办公室。记得同去的首批十几名知青分别被分配到报社的各个部门,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宣传报道的一线部门。轮到我们后边的男生报到时,报社办公室的一位老干部透过鼻梁上的花镜看了看报名册,又看了看我和身边的一位男生,慢悠悠地说:“冯学军,王学仁,好!高中生!一个学军,一个学仁,现在来到报社,那就再学农吧!你俩搭伴去农业组,那儿活多,正缺人手,会有干头。”就这样,我们一同来到农业组,机缘使我俩从素不相识到日渐熟悉,以至亲密。

以后我逐渐了解到,王学仁是这位同学的原名,后改名王晨。原是北京名校汇文中学68届的高中生,我们同届,都喜好写作和足球,又都是1969年初来延安插队的。他落户在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村,我在志丹县双河公社向阳沟。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爱好,使我们彼此间有了好感。

我们男知青都住进了报社一栋二楼的大屋内,四张上下铺的木床,就是我们八名知青的卧榻。说来也巧,同分在农业组的我俩竟同睡一张床,我上铺,王晨下铺,亲如兄弟。当年能来报社学习的机会难得,大家自觉性很高。平时学习勤奋,读报、收稿、阅稿、请教记者、处理群众来信……从早忙到晚,一般都是晚十点半熄灯休息。为起居方便,总是我睡上铺。可住往一觉醒来,窗外星光如水,下铺空着,大屋内仍在阅读或笔耕。他的钢笔字很漂亮,龙飞凤舞间,仿佛还在夜色银光中遨游行进。及至黎明时分,我下床尽量轻手蹑脚,生怕打扰劳累熟睡的小伙伴。

不久,我俩便“独立”接受了一次任务——采访报道耀县特色辣椒生产。临行前,报社领导对我们说:“农业组人手紧,派不出老记者带你们,你俩独立采访报道,行吗?”我有些犹豫,王晨略思片刻,镇定地回答报社领导:“可以,我们试试,尽力完成!”耀县在西安以北70公里,当时没有高速,我俩下午乘一趟班车,傍晚前到达县

城,先由县通讯组接待,第二天一早便直接深入到寺沟大队,住生产队队部大炕,在村委会办公室长桌前座谈,下大棚看秧苗,与关中老年在暖炕上采访聊天,走乡串户吃遍派饭。人生中首次耳闻目睹、亲身体会了关中农民的风土人情,挺有特色,甚开眼界!

我们白天东奔西走采访,晚上在队部炕桌上整理材料。我负责汇总素材,王晨负责梳理撰写。后者任务偏重,他却乐于承担,自然又要“夜战”。因同住一炕,我就不能早睡,陪着他看书看稿,直到夜阑星繁。

不觉间三天过去,初稿完成。在向村委会、大队党支部汇报后,村领导十分满意,夸我们干活实诚,为咱农民扬了名。晚间派饭特意安排在队部聚餐,还加了辣子炒鸡蛋、锅盔和耀县咸汤面。我们被关中乡亲的盛情所打动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又应邀去县机械厂采访。因时间紧,就没住招待所,只在厂车间的一间空房内安顿下来,便开始了采访。上午现场观摩,下午采访座谈,晚上汇总整理,第二天乘火车返回省城。四五天的辗转奔波,已经使我疲惫不堪。但令我吃惊的是,在行驶的火车上,王晨不顾旅途颠簸,竟又拿出采访笔记和初稿,摊开稿纸,在车窗旁的小桌上抄写起来。我看他在颠簸中一笔一画的姿势,嗔怪道:“车这么颠簸,写字太费眼,回报社我帮你抄吧!”他抬起头,揉了揉眼睛说:“坐车没事儿,趁有时间,有了思路,就赶快修改抄出,文章会增色的。明天汇报的时候,我们就更有把握了!”他的一席话,让我肃然起敬,心悦诚服!兄弟,好样的!

回到报社的第二天上午,我们就向农业组交稿,随后便得到了组长的赞许表扬,特别肯定了我俩的“独立自主”。组长对我们说:“不急,文不压死,好稿子再仔细打磨一番,定会更好!”于是,我们又老在老责编的指导下几易其稿,挑灯夜战的景象再次呈现。只不过我不忍再贪睡,而是倾力相助。终于在1971年3月中旬的《陕西日报》农业版上,我和王晨合作写成的稿件发表了,题目是《发展多种经营 辣椒生产喜丰收》。次日,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条新闻。这是那期学习班上,首篇由学员独立采访报道完成的大稿。在今天看来,这是关中父老在那个年代对我们北京知青接纳培育的成果!

学习班的尾声,听说要留数名知青在报社工作,大部分回归原队。听到这个消息,有些人心不安了。可王晨却十分坦然,依然学习、读报、采访、撰稿,一切按部就班。王晨说:“学习结束后,哪来哪去,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基层,理所应当!我们正年轻,路还长,陕北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啊!”我

也受其影响,珍惜这最后的培训时光,该干吗干吗。

1971年4月,我俩又重返延安插队的各县农村,躬身苦干数个春秋,先后调入各县县委宣传部工作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上过大学,担任过教师,中晚年回京,在北京宏志中学任教。后来,得知王晨担任了光明日报社总编辑。

1994年春,我们回京数年的北京知青发起编写《情系黄土地》文集。我有幸参与了筹稿、编辑工作,浏览了百余篇知青的力作。感慨之际,很想请当年的“搭档”也撰写一篇,并对知青来稿予以鉴别指导。但有人担心王晨担任要职,工作繁忙,不便打扰。可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让每位插友知晓,应该让每位插友都有发言权,并为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!

于是,我冒昧写信给《光明日报》,恳请王晨在百忙中能看看我们送上的这百余篇文章,予以点评指教,并期盼他也能撰文助力。

可能是王晨当年工作太繁忙了,信件寄出数月未见回音。但金秋时节传来喜讯:寄给王晨的知青文稿返回来了!他在百忙中还撰写了回忆自己当年在宜君郭寨大队插队经历的力作《塬上的雪》,阅后令人怦然心动!文中写道:“1970年春节,我是在队上度过的。乡亲们帮我把分到的八斤黄豆都磨成豆腐,足足二十来斤。我做了猪肉炒豆腐、豆腐汤、豆腐饺子等,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豆腐!”农村插队经历,使“我们看到了,听到了许许多多在学校在城市根本看不到、听不到的东西。或许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耳闻目睹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吧!”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,对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,对陕北父老乡亲的无限深情!

王晨在百忙中的撰文和支持,促使我们的《情系黄土地》文集于1996年1月正式出版,在全社会和知青间反响很好。

2000年的金秋,我终于在光明日报社见到了分别29年的插友王晨。这天下午,他正在单位值班,百忙中的相见极其珍贵难忘。回顾所走过的人生路,我俩首先就谈到了陕报的学习班,都感慨万千!最难忘的是他办公室内仍放着一张常见的席梦思床,桌上文件报刊满满,电话铃声时时响起……他表示,负责中央报刊工作,担子不轻,好在我们年轻起步时都在延安插队、在省报学习过,加班熬夜是常事。累了就在床上歇歇,起身之后再大步向前走。现在我们正在路上,应该为党为人民有所作为!

“时光荏苒,岁月流金!”51年后的今天,我愿把我的故事敬献给曾经关怀、帮助、培育过我们的新闻工作者,敬献给老区延安人民,敬献给全国的插友!